

重读八十年代

——兼及新世纪文学

王德领 著

學苑出版社

重读八十年代

兼及新世纪文学

王德领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八十年代:兼及新世纪文学/王德领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77-3373-0

I. 重…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450 号

责任编辑:潘占伟 陈俊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邮箱: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720×980 1/16

印 张:15. 7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 00元

●●●●目录

感官文学的生成及其局限 / 1

医生视角与身体叙事 / 31

不能承受的寓言化之重 / 60

八十年代小说的魔幻化书写及其困境 / 72

八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接受中的技术主义 / 88

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 / 110

穆旦诗歌中的现代主义 / 124

重写中国当代新诗史 / 174

走近真实的鲁迅 / 187

先天不足的先锋 / 194

柔软与坚硬 / 204

迷幻花园里的智者 / 208

驮盐与西藏民俗文化 / 211

挖掘文学现场：与作家对话 / 215

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 / 220

梦境与现实(代后记) / 244

感官文学的生成及其局限

——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

感官文学是一种身体叙事学，涉及爱情、性爱等人的本能欲望，在肯定利比多是爱欲动力的基础上，着重展现两性之间的冲突，在追求灵魂的超越与升华的同时，充分强调肉体欲望的满足。在新时期，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是，感官文学是借助革命文学而“发掘”出的，是革命文学的另一种激活方式。新时期的革命文学不但没有淡出文坛，反而通过对革命文学成规的改写与增补，出现了多样化的叙述形态，^①这既有王蒙借助西方意识流手法对革命文学在叙述策略上进行的“革命”性调整，也有张贤亮对革命文学进行更为激进的改写、戏仿，将革命文学引向感官化、市场化的境地，从而促使了感官文学的生成。而张贤亮式的感官文学却将性置于中心地位，是有性无爱的身体叙事学，它否定了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文学爱的母题，其负面效应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清理的。

^① 程光炜：《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小说〈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一、感官文学：在革命文学语境中

肯定人的身体欲望，特别是性欲，对性采取一种自然而非压抑的态度，是五四新文学所宣扬的人性、人道主义的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官文学其实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鸳鸯蝴蝶派文学、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郁达夫的表现性苦闷和性压抑的小说、以穆时英为代表的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新感觉派小说，这些小说的感官化因素自不待言，甚至革命文学也呈现出感官化倾向，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加恋爱小说。革命加恋爱模式受到左翼文学主将茅盾、瞿秋白等人清算后，30年代初渐成颓势，但是作为一种革命小说创作的可能性，始终或显或隐地出现在以后的革命小说中。茅盾的《子夜》不就存在一个感官化的上海吗？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革命成为压倒一切的叙事，恋爱遭到放逐。男女之爱被简化成在共同从事神圣的革命斗争或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同志式结合，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这成为当时文学的“成规”，若有越轨，即受到一些革命批评家的指责与质疑。五四以来所提倡的人性、人道主义被定位于资产阶级的情感。但是，革命与恋爱的叙事模式的影响根深蒂固，中国传统的言情小说更是源远流长，虽然作家们明白革命的神圣性容不得男女私情，但在涉及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描写上，涉及男女感情的纠葛时，依然为爱情留下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宗璞的《红豆》、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在发表或出版后，其中的爱情描写引起了较大争议，受到了一些革命批评家的批评。在神圣的革命主流叙事面前，表现情爱是资产阶级人性观的体现，是要从中加以坚决剔除的。“60年

代围绕这些小说的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的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的问题。”^①既然正当的爱情都难以挤进革命的宏大叙事，那么，描绘性爱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文革”文学中，连仅有的一点爱情叙事都被排挤掉，在按照“三突出”原则创作出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身上，“革命”被置于神坛之上，作品中充满了唯灵的中世纪气息，革命的纯度是类似于用坩埚来提纯加以保证的。

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步汹涌，爱情题材的禁区被打破了，出现了《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小说。这既有以呼唤纯粹之爱对婚姻问题的真情诉求（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有对封建主义对爱情的无情虐杀的控诉（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有对两性爱情平等的向往（如诗歌《致橡树》）。爱情随着人性的复归而回到文学中来。这种爱情，是建立在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基础上，以启蒙主义为基本内容的。

而张贤亮在1985年发表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热衷于表现将性置于中心地位的“大墙情爱”，当时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标志着一种以性欲望为中心的感官文学的产生。

感官文学是在“创作自由”的文艺政策、文学商业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首先，从文学的外部环境来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毕于1985年7月22日。1984年12月至1985年初，在中国作协第四次文化会上，中央在会上以“祝词”的名义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①《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构思与写作恰好在提倡“创作自由”之后不久，这并非是一种巧合。既然这种难得的自由是党提倡的，那么抓住这一黄金时刻创作出自己最想写出的东西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文艺政策的松与紧的变化是戏剧性的，在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1985年是文学出现大分化、多元化的关键一年。创作自由的观念促进了作品的自由发展。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第三代诗歌、试验小说、寻根小说、通俗文学等都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了挑战，“1985年的小说形势的一个突出印象，就在于从各个方面发出了集束性的‘挑战’。”^②这给中年作家施加了很大的创新压力，尤其是右派作家这些归来者。当人们更多的将眼光投向现在的时候，由于人们遗忘的天性和国家对文艺的引导，反右“文革”记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③在1984年的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反映时代现实的占了大多数，正如王蒙所说，“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那种热烈而又清醒的、步履坚实而又勇敢开拓前进的时代精神”。^④获奖的18位作者中，50岁以上的仅有1人，中青年作家占了绝大多数，而此时的张贤亮已近50岁了。靠回忆过去的苦难经历来写作的右派作家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如何写“现在”成为迫切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靠写反右题材成名的张贤亮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创新压力。

①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② 吴方：《断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

③ 在拨乱反正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主流叙事下，对“文革”的伤痛的描写风行一时。之后，国家对作家创作的引导倾向于对现实尤其是体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的关注。张贤亮在写《灵与肉》获了奖之后，有些人就引导他写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于是他在蒋子龙之后，写了《龙种》《河的子孙》等小说。其实，自80年代后期始，国家对“文革”、反右题材的小说加强了管理。

④ 王蒙：《评奖与获奖——在中国作协三项评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10月。

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当时的文化体制改革催生的产物。80年代中期，严肃文学渐成颓势，日益受到通俗文学的挑战，港台的歌曲、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以及受到知识分子鄙弃的凶杀、艳情等地摊文学，以潮水之势冲击着严肃文学的阵地，严肃文学图书的印数大减，出版严肃文学的刊物发行量大幅度滑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书刊的出版发行此时已经引入了市场机制，^① 因此，书刊如何迎合市场的需求，迎合大众读者的需求，成为当时读书界的中心话题。对通俗文学的争论一时成为热点。^② 为了追求利润以求生存，出版社竞相出版侦探、武侠、言情类作品，一些文学刊物放弃了精英意识，主动向通俗靠拢。《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出现的时机，“正当目前严肃文学（我不称之为纯文学）简直面临危机的时候，书店拒售，印数猛跌，通俗文学占领市场；这本书却能轰动一时，不待任何评论家去写文章揄扬，已经有大量青年读者闻讯赶去抢购，顷刻脱销。大有在市场上与那些侠客、艳尸、魔影……争一日短长的样子。”^③《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原名为《欠你一朵玫瑰花》、《菩提树》，这两个名字都不太煽情，均不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些通俗文学的味道，又能捕捉住“生命的感觉”。当时就有人指出，小说的名字有“铜臭气”，给人以“哗众取宠”的感觉，但

① 19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的外，“自负盈亏”。这是改革开放向深处发展的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体制的重大变化。在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下，民营的书商开始出现，开始参与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市场机制的引入，给中国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作家的写作和书刊的编辑由过去面临的意识形态的考量，转变为主要受市场因素的操纵。由此，国家对文学的控制因市场因素的介入而出现了松动。

② 当时的争论，主要是从维护严肃文学（或称为纯文学）的立场出发，多半对通俗文学的大量流行采取了激烈的批评的态度，表达了知识界对文学日益商品化的焦虑。《作品与争鸣》杂志在1985年对此有较详细的综述，并破天荒地选载了侦探小说，以表达对正在流行的通俗文学的关注。

③ 韦君宜：《一本畅销书引起的思考》，《文艺报》，1985年12月8日。

是却能“使它成为读者抢购、小贩高价出售的畅销书”。^① 在严肃文学出现危机的时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改名蕴含了浓厚的商业气息,隐含着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追求读者对自己更大的关注度的期许。因为在当时,对性和人体美的描写,只是见于一些被称之为“堕落、下流”的通俗文学、地摊文学作品中,在严肃文学里引入这些,不啻于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其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十分明显的。^②

二、感官因素呈现的“勇敢”与“迟疑”

通读张贤亮的一系列反映劳改生活的小说,我发现他在呈现感官化因素时,并不一直是勇气十足的,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犹疑、彷徨、小心翼翼的心态,其过程与思想解放进程的疾与徐、文艺政策的变化等文学的周边因素紧密相关。

《灵与肉》发表于1980年9月的《朔方》。小说中的许灵均与李秀芝的结合,在张贤亮的作品中是唯一一次和谐的婚姻。小说基调是爱国主义的,着重表现的是“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③。作品发表以及改编成电影后,都引起了争议。引人注意的是,丁玲写了称赞文章。^④ 也

① 刘蓓蓓:《兽·人·神——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

②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发表后,旋即有多家出版社在抢稿子。1985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时,首印10万册。

③ 《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灵与肉〉之外的话》,《小说选刊》,1981年1月号。

④ 丁玲对小说和电影分别写了一篇评论,即《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文学报》,1981年4月2日;《漫谈〈牧马人〉》,《文艺报》,1982年5月号。

曾被打成右派的丁玲的表态，对张贤亮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① 作品广受争议使张贤亮的声名鹊起，他开始从宁夏走向全国。随后，这部作品又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争议、赞誉、获奖，这极大地鼓舞了刚出道不久的张贤亮。劳改、女人、婚姻、家庭等关键字眼，从此就频繁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在1981年发表的《土牢情话》中，故事发生的场所是一间土牢，小说主人公石在是一个犯人，背枪的美丽的女看守对石在突然发生了难以理喻的爱，而石在对女看守的爱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他和背枪的美女唯一的接触只是一次心醉神迷的长吻。与《灵与肉》相比，男主人公变得焦虑、紧张、报复心极强，甚至为了保护自己，不惜将女看守出卖，直接导致了女看守遭受了连长的强暴。三年后，作者曾以十分复杂的心情谈起这个小说：“在这一页页纸里洒着我的泪水，因为故事里有我个人经历的一段影子：不是那缠绵的‘情话’，而是‘土牢’的恐怖和自己的迷惘。”^②这番话表露了作者对这篇爱情小说的真实性的质疑，显示了对小说所呈现的做作与矫情的不满。

《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十月》第2期。全书约13万字，当时是按中篇小说刊发的。^③ 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是针对“异化”、“人道主义”、“现代派文艺”。张贤亮写作《绿化树》时，正值反对

① 张贤亮迫切需要丁玲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肯定，深知得到这样的人物的肯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给丁玲的信中，他对丁玲引为同道，用了“万分感愧”、“潸然泪下”等字眼，极力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见《张贤亮致丁玲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

② 《肖尔布拉克》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

③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由于“文革”对文艺毁灭式的摧残，小说在废墟上生长的过程某些方面竟然与五四新文学初创期类似，比如小说繁荣的顺序先是短篇小说，而后是中篇小说，再次是长篇小说；对西方小说的饥不择食的态度，大量模仿之作问世；小说分类标准的混乱，把15万字左右的小说仍然称为中篇小说等。实际上，《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都应算作长篇小说。

精神污染运动的风头上，是在“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来的。^① 小说对爱情的描写并不占主要地位。以张贤亮一贯的政治敏感度，不可能不考虑到情爱描写的“分寸”。小说最大胆的地方只是描写了男主人公在马缨花家里二人动情的拥抱而已，他们两人的交谈并没有离开“吃”多远。那个野性的马缨花对自己“荒唐”的过去的讳言，对自己那个来历不明的孩子躲躲闪闪的交代，以及两人对“肉欲”的恰切控制，非常符合当时的审美规范。因此，《绿化树》顺利地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在《收获》1985年第5期头条位置。这一期可谓高手云集，除张贤亮外，还有莫言、马原、王蒙、曹禺、陈若曦、公刘，王蒙的重要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只是节选了7万字刊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文学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正面描写了性爱，描写了一个右派分子在劳改中性功能的失去和恢复。围绕着《绿化树》的争议尚未平息，张贤亮又抛出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了更大的议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真是一次激烈的争论，^② 堪与当年郁达夫的《沉沦》引起的反响相媲美。如果往后看，《废都》的出版后的反应也与此类似。

仅仅与《绿化树》相隔一年，羞羞答答的马缨花在这篇小说里变成了对性有着旺盛需求的黄香久，《土牢情话》中女看守与石在的接吻，《绿化树》中章永璘与马缨花矜持的拥抱，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快速进化到章永璘与黄香久床上的酣战。至此，张贤亮的笔墨可以说是完全放开了，他心中那个难以驱除的“鬼气”终于充分释放了出来。

随着文艺政策的松动，张贤亮越来越倾向于写自己内心深处的梦，即在牢狱环境里被压抑的性意识，以求获得性的“释放”与“补偿”。早在

①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文学家》创刊号，1984年4月。

②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就有44篇。

他写于1981年3月的一篇创作谈，就已经袒露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在他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中，“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这个“孤独感的内核”是理解张贤亮的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的一把钥匙。他接着解释了这种孤独感并非那种“怀才不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形而上的孤独感，而是形而下的所谓生命深处的情爱之孤独：“年过35而孑然一身”，“一股悲凉之情总会不可遏制地油然而生。可是，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都不许我感关雎而念好逑，于是我只得做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梦”。^①情爱的孤独化作了梦，对梦的呈现，就是对长期性压抑的释放与补偿。

但是，张贤亮对自己“向内心深处开掘”一直心存犹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正文之前的小序，暴露了作者在写作这部小说时的真实心态。这个小序非常重要，研究者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张贤亮在开篇写道：“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②“我”既是叙述者、小说中的主人公，又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作者自己。在张贤亮的小说中，这三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一的。在这里，“我”的欲言又止、犹犹豫豫、甚至是自责自谴的心态暴露无遗：小心翼翼、反复掂量、不敢越雷池一步，始终没有把“某些事情”袒露出来。接着，“我”通过对蛾子、太阳的叙述表达自己对永恒的理解，领悟出“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通过文中的背景可以看出，“我”不像以前几部描写过去的小说那样和过去贴得那么近，而是站在“现在”回溯记忆中的右派经

① 《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3月号。

② 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有关小说的引文，均出自此书，恕不一一注出。

历，心境是平静的，而在平静的心情下才适于挖掘内心的隐秘，参悟人生要义，“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永恒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接着，“我”进一步领悟出，那种“稍纵即逝、无可名状”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永恒、感觉、内核，在这里是同义重复，显然是属于过去时的，而现在都一统于“我”的生命中。这里“化不开的内核”和“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是一致的，正如此前所分析的，“孤独感的内核”指的是情爱的孤独，是在情欲折磨下落魄的单身老男子的“艳遇梦”。接下来，作者写道：“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内核”依托梦境而存在，作者在此设置的梦和四年前所说的“做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梦”不谋而合，或者说是作者借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以作家的白日梦方式实现了在劳改时所做的“罗曼蒂克的梦”。接下来，作者将我们引入梦境之中，引领我们回访劳改过的农场，在虚无缥缈的境地中，“芦苇丛”意象反复出现，先是看到了一只猫，再是看到了四只鸭子，它们都是“我们”原先丢失的，在此引领“我”走向梦的深处。而梦的深处，则是“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是真正的生命的波动”，也就是那个具有永恒意义的“化不开的孤独感的内核”，“生命的意义、永恒，都寓于那迷离恍惚之间了”。在一次次梦醒时分，“我”跟自己论辩，诘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梦用笔来补充、续接出来？真实地、坦率地、又条理地、清晰地纪录那失去的过去？”接着，“我”在寻梦的过程中，终于克服了犹豫、彷徨的心态，回答了在小序开头的提问：“没有什么可感到愧悔，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怎么能用观念中的道德来判断和评价生命的感觉？”“我”终于克服了“愧悔”和“羞耻”，克服了“道德”维度的羁绊，决心将“生命的感觉”和盘托出了。在这里，作者一再强调的“生命的感觉”就是

情爱，但不是一般的情爱，更确切地说，是惊世骇俗的性爱，因为“我”之所以这么犹豫，甚至置“道德”评判于不顾，肯定不是一般的情爱了。“我”接着反问道：“谁又有权力指责”这种“生命的感觉”？在小序的末尾，“我”获得了“一种坦然的出世的心境”，“出世”一词正暴露了“我”决心袒露的这种“生命的感觉”是不便在世俗的心境中吐露的，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赶紧一跃而起，奋笔疾书。我知道，如果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我又会改变我这个主意”。虽然“我”决心已下，但是最后这句话仍暴露了“我”写作此文时的真实心态：犹豫、彷徨、迟疑不决。

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创作自由”的口号刚刚提出的文学环境里，张贤亮借助于梦境，对于劳改生活中的“生命的感觉”的呈现既有果敢的一面，又有因世俗的“道德”的考虑而带来的犹疑与迟疑，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把这种“生命的感觉”提升到“生命的终极意义”、“永恒”的高度，提升到“压缩了人类亘古以来的经验”的高度，一方面又“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经过不断的寻梦，选择了在一个出世的心境中，以续写自己反复做过的一个过去时的梦境方式，尽量虚化这种“生命的感觉”的现实色彩，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感官因素呈现出来。这还原了作家当时的一个“浪漫蒂克的梦”，而这些对人的肉欲的张扬，显然迎合了从禁欲时代过来的人们最隐秘的渴望。

三、性与政治：在唯灵与唯肉之间

性与政治的复杂缠绕，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性是禁区，对性、情爱等有关的感官因素采取了激烈的排斥态度。在强势的政治话语的覆盖下，人的灵与肉是分裂的，无限丰富的人性被简化为干瘪的阶级性，禁欲主义大行其道，小说中充满

了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唯灵气息。

在《绿化树》中，性与政治的关系基本上没有摆脱十七年文学的叙述框架，政治占据主导地位，性爱、情感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作家将《资本论》大段大段引用，以增加小说的政治色彩，让章永璘手捧《资本论》，怀着“虔敬的心情”，当成《圣经》来读，作为自己灵魂的导师来对待，以期望在“灵”上超越自己的阶级，成为无产阶级新人。《资本论》是一个政治符号，它在文本中一再出现，缝合了小说因写饥饿、爱情、苦难而产生的文本裂隙，照亮了文本中的阴暗面。

当章永璘在马缨花家里控制不住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欲，忘情地拥抱了马缨花时，劳动人民马缨花及时地制止了他，接着，他用了整整一节4000多字的篇幅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当然，这种忏悔有其深层的原因，情欲属于人性论的范畴，特别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情欲，以当时的文艺政策来衡量，更是“不洁”的，是要作为“精神污染”加以清除掉的。作者在文本中对此预先进行了灵魂的“大批判”，以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责难。需要指出的是，对自己流露出的肉欲痛加自责，这里延续的是十七年文学的写法。比如，《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者卢嘉川和江华，都对林道静产生了深深的爱，但是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他们认定还有更崇高的革命目标需要献身，儿女情长是不对的。只是在革命有了闲暇之时，江华才将这种爱恋吐露出来，并留宿在林道静的住处，行短暂肉体之乐。而在《青春之歌》中，这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最为常见的情景是，反面人物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欲，陷入到感官享乐的泥坑里。

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性明显地压倒了政治。小说采用的是感官化视角，叙述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性欲上。从表面看来，故事发生在“文革”末期，讲述的是一个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所经历的一场不成功的婚姻，但是内核却是集中在男性对女性的

欲望化上，表现了对性的热烈追求和充分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唯肉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一个热门话题。登载小说的杂志被抢购一空，许多年轻人抢着阅读此书，仿佛在偷尝禁果一般。“在严肃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人体的描述也很少有如此细微的”，^①“对性欲的表现达到了很惊人的地步……以中国当代文学而论，这大概是破天荒头一遭。”^②当时，对小说持肯定性赞赏性评价的，有黄子平、蔡葵、蓝棣之、许子东、曾镇南等。作者借政治的外衣，详细描写了女性的人体美，用比喻大段描写了做爱的场面，几近赤裸裸的，拿到今天来看也不落伍。当时有评论诘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表现的是一种“奇怪的‘政治性学’”：“难道描写这种性疯狂、性变态，乃至描写性机能的丧失，就能算作显示特殊环境对人性压抑之深，难道显示环境对人性的扭曲达到了产生性疯狂、性无能的地步，就能算作最深层次的暴露？”^③其实，这种批评也很有道理。这种畸形的性爱的发生实在是很勉强很不自然的，可以说是很怪异的，做作的，以性机能的丧失来比喻整个知识界被阉掉了也非常牵强，失之于简单化。现在看来，那些当初热情肯定这部小说的人，主要是就其中的性描写突破了创作禁区而喝彩吧，因为在当时“创作自由”的口号下，“性描写的禁区不仅可以冲破，而且应该冲破。它本来就是宣传社会主义人性、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创作自由’口号的积极响应。因此我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创作上带有标志性，它具

① 石铨：《一个危险的艺术信号——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意识描写》，《今日文坛》，1986年第2期。

② 《一个特定时代的“忏悔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辨析》，《小说评论》，1986年第3期。

③ 《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3期。